

中文版序

1999年秋，美國布蘭迪斯大學 (Brandeis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戴瑞福 (Ralph Thaxton) 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邀請我加入一項學術基金申請項目，合作研究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初期的中國農村社會變遷，重點包括大躍進饑荒等相關事件，方法以口述歷史為基礎。當時我正在努力將博士論文修改成書稿，主題是民國期間的國家與農業。隨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漸意識到，應該以長時段尺度去審視民國的農業史，把研究範圍延伸至共和國初期。於是我接受了戴瑞福的邀請，並決定在來年夏天回中國時進行我的首次農村訪談。戴瑞福與我的合作最終因未獲得基金而中止，然而，我在2000年暑假在安徽農村做的訪談讓我改變了研究方向。我決定要先專注寫一本以農民的故事為主的大饑荒研究著述。大饑荒無疑是一場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歷史事件，但那次訪談讓我認識到，經歷過大饑荒的農民正逐漸逝去，我必須抓緊時間挖掘他們的故事。

這一轉變使我的研究在農村沉了下去，成就了這部大饑荒的底層史專著。一切都很自然地發生。在第一次農村訪談得出結論後，新問題隨之而來：為什麼相鄰村莊的饑荒經歷很不一樣？從鄰近的村莊向外遠眺，遠處還有不同的地區，那裏的村莊坐落在不同的自然環境，形成於獨特的文化傳統，呈現出多種群居類型，有着頗具差異的村莊社會機制。在更遠之處，還有不同省份。這一沉下去就是多年。在國內同

行、同學和親朋的幫助下，我訪談了許多村莊，對大饑荒有了重疊、類比、多視角的理解。這一底層視角的研究與法國年鑒學派著名農民史學家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從一個村莊去揭示一個時代的範式或結構的微觀史學方法不一樣。大饑荒是一場全國性的大災難，單一村莊或地區無法解釋農民在災難中的死亡與生存現象。它需要審視多個地區和各種類型的村莊，懂得每個村莊的自然環境與農業實踐、歷史文化與傳統、社會結構與機制，這樣才能以累加的經驗從底層角度去分析這些村莊的農民在大饑荒中經受的苦難與應對的措施。

沉下去之後還需要浮起來，因為從底層研究大饑荒不只是为了記錄農民的往事。村莊級的歷史資料要與更大範圍的歷史事件有機地結合，形成微觀與宏觀的互證，使人們理解巨大的災難怎樣改變了普通人的命運，而普通人在大饑荒事件中如何抓住或創造機遇去獲得生存。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通過浮起來，人們能夠俯瞰到中國農村的根本建構。在共和國前期，大多數村莊已延續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之久，它們以血緣關係立村，形成了中國農村以祖先崇拜為特色的傳統文化。共產黨的土改和大躍進對這一根本建構進行了打擊，卻未能摧毀它，許多農民在大饑荒中依靠血緣的凝聚力得以生存。這也是本書將宗族機制視為農民生存關鍵因素的原因。我當然也希望中文讀者能夠體會到改革年代農村宗族在市場作用力之下的潰散，通過本書理解到的不僅是大饑荒中農民的生死，還有中國農村社會機制經過千年的發展，正面臨其根本性式微的命運。

就潛在動機而言，研究大饑荒史源於我自己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終極關懷。文革期間，我作為知青在一個村莊插隊五年多，也就是本書第一章的老瞿村，目睹了農民(包括我自己在內)在一年裏勞作三百多天卻仍舊一貧如洗的境況。那時的勞動強度，正如插隊小組的一位同學在詩中所寫，「翻場直至三更夜，割稻彎腰對曉星」。即便如此，每年我們依舊是「春荒每缺半年糧」。當時我不能理解，為什麼農民如此辛苦，生活卻未有改善。1980年代，我在美國讀博士期間，參觀了一個美國的農場，並坐在農場主龐大的採棉機上觀看了機器採棉的全過

程。今天，中國的許多農場也已實現了機械化採棉，採棉機稀鬆平常。但在那時這對我是一種震撼，一台機器一天採摘的棉花，遠超過我插隊村莊整個生產隊全體勞動一天的產量。那時的我反思：中國農民是如此勤勞，甚至勝過美國的農場主，卻為什麼無法致富？中國農村到底有着什麼樣的問題，它如何才能實現現代化轉型？正是這種關懷讓我在寫博士論文時選擇了農業史的課題，並在後來延伸到了大饑荒的研究。西方關於中國農村和農業史的學術書籍汗牛充棟，本書對中國農業的現代轉型可能未必有什麼重要的學術貢獻，但它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兩點。第一，在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國家不適當的雄心和政策給農村社會造成怎樣的具體傷害；第二，農民並非在飢餓中被動等待死亡，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努力求生，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蛇有蛇路，鰲有鰲路」，活下來就行。正是這種善於尋找生存機遇的不屈意志，使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衝破禁錮，湧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匯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農民工遷徙潮。

大饑荒導致了農村人口大量死亡，寫起來不免讓人感傷，尤其是寫到有名有姓的個案時。德國漢學家文浩 (Felix Wemheuer) 在以民間記憶為資料完成了河南大饑荒博士論文後，曾覺得再也不要研究這個令人痛苦的課題。美國歷史學家柯偉林 (William Kirby) 在讀了本書英文版後也告訴我，這是一個「令人極為沮喪的故事」。既然專家學者都有此感受，那麼不難理解，一般讀者也許更喜歡輕鬆愉快、充滿知識與智慧的建設性故事。畢竟，當今讀者多數已解決溫飽問題，且忙於各種工作。問題在於，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本身太過沉重，歷史學家無法迴避時代的艱辛。那是一個生活貧窮、物資匱乏、政治運動連綿不斷的時代，任何人只要讀一遍 1981 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便能理解中國社會底層農民的艱難處境。在訪談中，我曾問過一些農民，是否對親人在大饑荒中的死亡感到悲傷？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死了就死了，還能怎麼樣？國家沒錢賠你，公社沒人管你，只能任其自然。確實，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故事。但這樣的歷史悲劇需要翻篇，唯有直面才能真正翻篇。對於大饑荒，歷史學家不僅要揭示其發生的原

因及後果，還要通過嚴肅、細緻的著述幫助人們理性認識這段歷史，最終從情感上釋懷。

歷史需要翻篇，因為中國社會要達成對過去的政治共識。從土改、大饑荒直到文革，中國經歷了太多的大事件，這些事件給普通人帶來了巨大苦難，也引發了無數爭議。爭執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高層領導雖然承認國家政權在某些事件中犯有錯誤，但卻從宏觀視角將這些事件的歷史必然性進行了合理化，提倡對歷史的正面認知。迴避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書寫，導致人們難以看清歷史的真實面貌。2021年，尼日利亞著名女作家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德國洪堡論壇批判歐洲殖民主義的著名講演中，對歷史的不完整性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說法。面對冠蓋雲集的歐洲文化精英，阿迪契指出：「我們不能只挑選某些事件和觀點來構成歷史……德國是貝多芬和巴赫的德國，但德國的學校有講授德屬西南非洲嗎？它們有告訴學生十萬赫雷羅人遭到了德國的種族屠殺嗎？學生們知道納米比亞婦女在德國的強迫勞動營中淪為性奴隸嗎？如果沒有，那講述部分真相的歷史就是謊言。」這種批判精神同樣適用於當今中國對歷史的片面理解。事實上，劉少奇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已經為大饑荒做出了總結：「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饑荒乃至共和國早期的沉重歷史是可以直面的。今天的中國已從共和國早期的貧窮國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各處展現出現代化的氣息。這一發展並不能抹去沉重的歷史。通過公開的研究和討論，人們能夠正視歷史，釋懷曾經的苦難，並從中汲取教訓。只有這樣，中國社會才能在歷史認知的基礎上形成更深的社會共識，奠定一個為大眾所共同尊重的社會基礎。正如阿迪契所言，「每個國家都有希望忘卻的不光彩歷史，讓這些歷史見光需要勇氣……而勇氣在於相信我們會變得更好。」在這一意義上，我希望本書能讓中文讀者直面歷史，讓人們知道大饑荒對中國農民的傷害，以及農民為生存所做的努力。如果中國的學界依然迴避大饑荒等沉重的歷史事件，那麼它只將這些歷史事件的話語權拱手讓給海外的學者，幾代人恐怕都只能從海外文獻來了解真正的共和國史。

本書的英文版 *When Food Became Scarce: How Chinese Peasants Surviv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於 2024 年 8 月出版，全書共八章。英文版的書名可中譯為《當糧食短缺時：中國農民如何在大躍進饑荒中生存》，最初的副標題是《中國農民在大躍進饑荒中的生與死》，旨於引出全書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決定了中國農民生死命運？後來，康乃爾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艾米莉·安德魯 (Emily Andrew) 在讀過我的寫作大綱後，建議將副標題聚焦於「生存」，以更好地突出全書論述的核心。中文版書名在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陳甜和陳沅宜反復討論後，最終確定為《經驗饑荒：自然環境、社會機制和中國農民的生與死 (1958–1961)》。主標題中的「經驗」一詞，不僅體現農民經歷饑荒的過程，也蘊含他們對此有所反思，意圖傳達出本書是以口述資料為基礎，並希望從人民的集體經驗中提取歷史的邏輯。副標題則清晰地帶出本書的研究視角和面向：自然環境和宗族機制是從底層理解農民生死分野的兩大關鍵因素。中文版的基本觀點與英文版一致，但針對中文讀者進行了重新寫作，並增加了第 5 章和第 8 章，以及其他未收錄於英文版的資料。這兩章重點討論了農村基層幹部和中國人民救命軍案件，進一步豐富了全書的論述。

陳意新

2024 年 11 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致謝

本書得以完成，我必須感謝來自眾多個人和機構的幫助。首先，我要感謝那些向我提供食宿的村民，他們更跟我分享了村莊的歷史記憶，尤其是在大饑荒時期的生活。多年來，我與兩位中國同行在42個村莊對137名農民進行了共177次訪談，還記錄了許多其他農民的口述資料。這些「其他」農民通常是自發加入訪談現場，分享了他們的經歷和所知的村莊歷史，但在訪談尚未結束時便離去，以至於我們未能記下他們的姓名。我們還在17個城市、縣城和鄉鎮對40人進行了共45次訪談，大多數受訪者曾擔任縣級和人民公社層級的幹部。我們從他們那裏了解到許多關於基層政策問題的知識。雖然本書終於能夠呈現到許多受訪者的故事，但大多數接受訪談的農民都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大饑荒艱難經歷被寫入書中，實在是非常遺憾。

其次，我要感謝協助我研究的中國同行、朋友和老同學。我去農村訪談時的研究課題是毛澤東時代到改革初年中國農村社會的變遷，其中大饑荒是一個重要時段。在安徽，王朔柏、沈葵、于思德、陳意雲、方向東、胡衛星、朱樂寧、彭克明、何小剛、李承磊和黃文治陪伴或介紹我到不同村莊，那些村落通常是他們父母或親戚的家鄉。他們介紹我與村民認識，安排我住在村民家裏，並將村民的方言翻譯成普通話，最重要的是說服村民接受我的訪談。在江西，肖唐鏢和邱新有也為我做了同樣的安排。我特別感謝安徽大學的王朔柏和安徽社會科學院的沈葵，

他們同意與我合作進行這項研究，並多次前往農村進行訪談，對本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我也要感謝一些協助過我但希望保持匿名的中國同行和朋友。

我還要感謝許多機構對我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豐富藏書和資助，使我得以在那裏進行兩個暑期的研究。安徽大學接待了我早期的研究活動，並允許我使用其圖書館。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為我安排了一次特別會議，讓我了解到該省省級和縣級方志機構如何將檔案彙編成地方志，這些資料成了本書的重要基礎之一。我也感謝安徽社會科學院的安徽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與我分享他們的文獻資料。

特別感謝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威爾明頓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Wilmington) 的支持。通過暑期計劃、卡希爾獎 (Charles L. Cahill Award) 和減免教學工作等方式，學校向我提供了慷慨和持續的資助，使我有機會多次前往中國農村訪談，並有專門的時間寫作。我任職的歷史系還通過摩斯利獎項 (Thomas Moseley Award) 多次資助了我的中國之行。我所屬的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術學院也資助了本書的出版。

我從許多學者的耐心指導和與他們的交流中獲益匪淺。布蘭迪斯大學的戴瑞福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的彼得·科克拉尼斯 (Peter Coclanis) 都仔細閱讀了我的初稿，並給出了寶貴的建議。許多其他同行都讀過一個或多個章節，或是在我向學術會議提交論文或受邀做專題講演時，討論過某一章節。這些同行中，我要感謝聖地亞哥州立大學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的艾志端 (Kathryn Edgerton-Tarpley)、斯沃斯莫爾學院 (Swarthmore College) 的李明珠 (Lillian M. Li)、密歇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韋思諦 (Stephen Averill)、哈佛研究所的馬若孟 (Ramon Myers)、科隆大學的文浩、康考迪亞大學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艾枚 (Kimberly Manning)、都柏林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的科爾馬克·奧格拉達 (Cormac Ó Gráda)、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印度金達爾全球大學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的丹尼斯·萊頓 (Denys Leighton)、上海交通大學的曹樹基、

北京大學的劉詩古和慶應義塾大學的鄭浩嵐。我也要感謝哈佛大學的柯偉林、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聖和墨爾本大學的高安東(Anthony Garnaut)，他們在研究過程中與我交流並給予鼓勵。我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熊景明、李磊(Pierre Landry)、金觀濤和劉青峰，他們多次與我討論了我的研究和資料。本書的兩位匿名評審也提出了詳細和建設性的批評意見，幫助我加強了論據的使用和寫作質量。

北卡羅來納大學威爾明頓分校歷史系的同事們馬克·斯波爾丁(Mark Spaulding)、麥可·塞德曼(Michael Seidman)、凱瑟琳·伯克利(Kathleen Berkeley)、蘇珊·麥卡弗里(Susan McCaffrey)、保羅·湯恩德(Paul Townend)、琳恩·莫倫瑙爾(Lynn Mollenauer)、麗莎·波拉德(Lisa Pollard)和文卡特·杜利帕拉(Venkat Dhulipala)，他們讀了我的研究計劃、初稿章節以及研究資金申請書，給予我持續的鼓勵和支持。我尤其感謝斯波爾丁，他閱讀並幫助我修改了英文初稿。當然，本書中任何事實或解釋上的錯誤都由我個人負責。

最後，我要向妻子郁敏表示感謝，她在我進行研究期間經受了頻繁的分離，她多年來的鼓勵和支持使我得以完成本書的研究和寫作。